关于契丹大字的拟音问题

聂鸿音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学界对契丹大字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解读的词语从以前的二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多个，解读的范围也从以前的数目字和干支拓展到人名、地名、官名、亲属称谓以及一些常用动词。可以预料，随着更多契丹词语解读工作的完成，通过文献记载及亲属语言的比较来复原契丹语言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主导潮流。本文的目的是对现已解读的契丹大字在其读音方面进行初步商讨，希望能为研究契丹文字的专家们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思路。

一

猜测契丹大字读音的初次尝试出现于1979年，当时涉及的只有一个“纵”字[①]。著名契丹文专家刘凤翥利用了与之同形的汉字、女真字读音以及汉文古籍中的同音假借例证，初步猜想契丹大字“纵”的读音与汉字“游”、“幼”、“优”相同。刘先生关于语音的这个假定也许并非错误，但由于他在文中误释了契丹大字“纵”的字义，所以后来人们也不再谈论它了。

① 刘凤翥《关于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纵”的读音》，《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

解读契丹大字墓志的首篇论文发表于1957年[①]，25年以后又有一批契丹墓志的考释文章相继问世[②]，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了契丹大字的读音问题，只不过他们猜测读音的目的仅仅是识读契丹文字而不是恢复契丹语言。比较能够接触到拟音实质的是刘凤翥对契丹大字“𠂤”（岁）的探讨[③]，在这项研究中，刘先生分别确认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当“岁”讲的词，然后据契丹小字的拼写法推出契丹语“岁”应该读作ouan。尽管这个虚拟的ouan不大符合阿尔泰诸语言的音位组合模式，也不能完美表现它与《华夷译语》记录的“桓”（on，年）、现代达斡尔语的xoon（年）之间的关系，但大体上还是可以让人感到满意的，相比之下，刘先生在四年后又把“年”构拟为和“父”同音的ai[④]，反倒不如以前的结论合理，尤其是就此估计汉语中当“父亲”讲的“爷”来源于原读ai的契丹语词，恐怕更难令人信服。《木兰诗》“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名句以及《玉篇》“爷，俗为父爷字”的训解都可以证明它是南朝梁的俗语，和契丹语有关联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小的。

1995年，丰田五郎在对一大批契丹字义提出假设的同时构拟了31个契丹词语的读音[⑤]，共涉及49个契丹大字，43个译音汉字。这本是第一次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真正的构拟，可惜原文的排版和校对都相当粗劣，使得印出的拉丁字母转写有很多都错

① 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② 有关的文章主要有：刘凤翥、马俊山《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文物》1983年第9期；刘凤翥、于宝林《〈耶律延宁墓志〉的契丹大字释读举例》，《文物》1984年第5期；阎万章《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1988年第3期；金永田《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考古》1991年第4期。

③ 刘凤翥《契丹大字“𠂤”的读音》，《民族语文》1992年第1期。

④ 刘凤翥《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读》，《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

⑤ 丰田五郎《解读契丹大字的线索》（肖爱民译），《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赫等编），文史出版社，1995年。

得不堪引用，读者只能参证相关材料勉强去揣摩丰田先生的本意。在这项研究中，丰田先生从汉字对音入手，兼顾古文献里关于契丹词语的记载和契丹小字的拼读法来构拟契丹大字读音，其推导过程是比较严密的，因而其结论无论用汉语还是用蒙古语来衡量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完全有资格作为学界深入讨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刘凤翥在《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读》一文中又新释出了一些契丹字，并且猜测了几个契丹大字的读音。当然，刘先生在文中拟“家”的韵母为 ə，拟“静”的声母为 tɕ，实际上根据的都是现代汉语而非唐宋旧音，这显出他对汉语音韵学的熟悉程度远不及他对契丹文字的识读水平。

一切都还处在创始阶段，因此对拟音细节的苛求恐怕不大现实。目前我们应该从分析可供利用的资料和方法入手，力求先使构拟契丹语音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的头脑中变得清晰起来。

二

契丹大字是在汉字的启发下创制的，其中借用了不少现成的汉字形体，有的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去，也有的是对某些笔画进行了增损或改易，这些字我们可以统称为“假借汉字”。黄振华先生曾反复提醒学界，契丹假借汉字也像日本“当用汉字”那样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音读”，即借用汉字式的读音来表达契丹语的意义，一种是“训读”，即借用汉字的意义而读以契丹语音[①]，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种，即形音义三者都采自汉字的、纯粹的借用。这三种方法在除西夏文以外的所有仿汉字式文字系统中都不难找到，因而可以看成是外民族借用汉字的三种基本方法。契丹文字的研究者大都不使用“音读”和“训读”之类术语，但他们对契丹文字的解读仍然体现了对这类情况的肯定。事实上，要肯定音读和训读的存在并不难，难的是面对具体的契丹字词时应该怎样鉴别它们。例如我们在契丹文墓志中看到了和汉文“皇帝”字形完全相同的一个词，并且通过研究证明其意义肯定也是“皇帝”，但仅就这两个字来说，我们却无法判断契丹人采用的是音读还是训读，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应该把“皇帝”这两个假借汉字的契丹读音构拟成 qoŋti（汉语的“皇帝”）还是 qahan（阿尔泰语的“可汗”）。凡遇到这类情况，人们一般都会去参考这个词在契丹小字里的读音，契丹小字主要是以表音字符构成的，且解读成绩远比契丹大字要好，这样，假如某个契丹小字词语的拼读法证明其字音接近汉语，那么人们就可以判断相应的契丹大字采用的是音读，反之则为训读。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对应词语还很少，所以常常不得不凭主观想象来判断契丹字的音读和训读，这时最自然的感觉就是断其为形音义都照搬汉字，即认为契丹大字的“皇帝”读如汉语的 ɣuaŋti，意思也同汉语的“皇帝”。这样的猜测固然有许多是正确的，但毕竟不能做到在所有的词语上都不失误，只不过今天我们关于契丹语文的知识极为有限，无论是谁都还没有能力为每一项猜测找到百分之百的实证。

不管是论证还是猜测，一旦认定了某个假借来的汉字是音读或训读，我们就可以参照不同的资料来复原它的契丹语读音。

当着手为契丹大字中的音读汉字（含纯粹借字）拟音的时候，人们自然希望能从汉语音韵学家那里搬来一套关于辽代汉字读音的现成研究成果，然而，契丹人口中的汉语声韵格局是什么样子，这在汉语史上也始终是个空白，这迫使契丹文字的研究者不得不借用隋唐时代的“切韵音系”和元代的“中原音韵音系”

① 黄振华《契丹文山、山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2 期；《契丹文天干名称考》，《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4 期；《契丹文地支名称考》，《民族古籍》1986 年第 2 期；《契丹文年月日数字名称考》，《民族古籍》1987 年第 3 期。

来权充拟音的基础。20 世纪末的语文学名著《契丹小字研究》就是这样做的[①]。不过人们也很快就发现，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大量事实是切韵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所不能解释的，也就是说，契丹人学说的汉语实际上无论是和切韵音系还是和中原音韵音系都有相当大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很复杂，既有语音演化也有两种语言对译时出现的临时性音位替代，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②]。我们这里想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在构拟契丹语音时与其利用汉语音韵学构拟系统，不如利用基本同时代的其他阿尔泰语言对音资料，因为后者更能直接地显示契丹人和汉族人对彼此语言中各个声韵类的理解。从唐代至元代的几百年间出现过大量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对译资料，就目前所知，对构拟契丹语音有帮助的主要是回鹘文《玄奘传》和蒙语对音《元朝秘史》两种。回鹘文《玄奘传》是慧立、彦悰的名著《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回鹘译本，大约译成于公元 11 世纪，中国、德国、俄国和土耳其均出版过不同卷次的整理本，其中第五、六、八、十诸卷的汉语译音词及其对音规律已单独整理发表[③]。《辽史·皇子表》载，当初耶律迭剌是在回鹘字的启发下创制契丹小字的，由此可知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一定很大。不过初步的研究表明，回鹘人学的汉语和契丹人学的汉语可能不属于同一个方言[④]，它们之间在声母方面歧异较小，而在辅音韵尾方面歧异颇为明显。《元朝秘史》或称《蒙古秘史》，是一部汉字音义对译的

①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②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看聂鸿音《番汉对音简论》，《固原师专学报》1992 年第 2 期。

③ 聂鸿音《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民族语文》1998 年第 6 期。以下引证汉文—回鹘文对音例子均出自该文。

④ 聂鸿音《近古汉语北方话的内部语音差异》，载《学术之声（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0 年。

蒙古语史书，20 世纪前后，中、英、法、德、俄、日、匈等国均出版过整理本。书中的人名、山川地名、种姓名的蒙文转写及对译由方龄贵整理成“通检”一册[①]，虽然所收译音字不全，但毕竟十分利于翻检。与回鹘文《玄奘传》相比，《元朝秘史》的蒙汉对音系统明显近似于契丹，在韵母方面尤其如此。

关于鼻音韵尾，我们也许还可以从辽人的诗文用韵规律中得到一点启发。例如懿德皇后萧观音《回心院》词第一首的押韵字为“殿暗面殿宴”，第六首的押韵字为“茵陈人茵临”，这都是把中古汉语的 -n 韵和 -m 韵押在一起了；沙门方偁《易州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的押韵字为“听声灵城生英坑屯更身乘真”，这是把中古汉语的 -ŋ 韵和 -n 韵押在一起了[②]。按照传统的汉语音韵学，我们应该把此类现象解释为当时当地的汉语方言不能区分 -m、-n、-ŋ 三个辅音韵尾——辽人或者把它们都念成了 -n，或者把它们都念成了 -ŋ。不过，迄今还没有人对全部辽人诗文用韵进行归纳研究，更没有人将这类用韵特点与契丹音韵进行对比分析，因此我们以上关于鼻韵尾的假设还不能视为定论。

与构拟音读字不同，构拟训读字主要依靠的是亲属语言间的比较。尽管现代的比较语言学还不能告诉我们契丹语的直接后代是什么语言，但它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清朝乾隆年间曾经用“索伦语”来校订《辽史·国语解》，说明当时人们认为最接近古契丹语的是“索伦语”，也就是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鄂温克语，这种观点不大为当代学者所接受。目前人们在构拟契丹语时参考最多的是蒙古语和达斡尔语，将来也许会参考到卡尔梅克语和布里亚特语等。如

① 方龄贵《元朝秘史通检》，中华书局，1986 年。以下引证蒙古文—汉文对音例子均出自该书。

② 原文据陈述《全辽文》第 62、257 页，中华书局，1982 年。

果进一步考虑到民族文化的接触对语言造成的影响，那么回鹘语、女真语也是构拟契丹语的重要依据。当然，实际的构拟工作还要有一个前提，即人们必须事先通过某种途径对所要构拟的契丹词语有一定的了解，包括它的意义和大致的读音，哪怕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也行。例如我们虽然知道数词“五”在现代蒙古语里是 tabă，在达斡尔语里是 taaw，但我们还是没有把握猜测契丹语的“五”读作什么，而只有当我们看到《辽史·礼志》说契丹语的“五”读若“讨”时，才可以比较肯定地把它拟作 taw。中国史书记载的契丹词语不是很多，且散见于《辽史》及多种古籍里，于宝林日前已将其辑出，共得三百余条[①]。尽管其中多为专有名词，普通名词为数极少，但这毕竟是我们仅有的第一手材料了。

研究实践证明，在尝试构拟契丹读音时，只要慎重地利用上述资料，严谨地遵循上述思路，最终结论就不会距事实太远。另外，由于契丹大字是在汉字基础上制成的，我们的拟音若能同时解释契丹字形和汉字的关系，那么自然更能赢得学界认同。

三

在丰田五郎 1995 年复原的 31 个契丹词语中，有 24 个被认作汉语借词。丰田先生据汉字为它们拟的音有两点是值得称道的：第一，汉语精母（含清从母）作 s－不作 ts－，如宗 suŋ、子 si、将 siaŋ[②]；第二，汉语四等字不带-i-介音，如天 ten。这样的拟音不但得到了契丹字解读实践的验证，而且也符合中古汉语和一批少数民族语的对音规律。

①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第 256－338 页，黄山书社，1998 年。

② 为使注音符号统一，本文把丰田原文的拉丁字转写一律改为音标转写。

丰田先生设定的声母格局中有四个地方应该修正一下：第一，契丹语中只有一套塞音声母，并非如丰田所说有送气塞音和不送气塞音两套，这在契丹小字译例和汉文古籍的异译字中反映得很清楚，如“比”通“皮”、“得”通“特”、“葛”通“阔”等[①]。第二，汉语非敷两个声母的拟音当作 p－而不当如丰田作 f－，契丹小字和汉文古籍的译音都可以证明契丹语没有 f 声母[②]。第三，关于汉语匣母字，丰田先生给出了 ɣ－和 q－两个拟音——皇 ɣoŋ、韩 qan，这和我们掌握的番汉对音情况刚好相反，匣母应该是只在元音 a 前译 h－，而在其他元音前译 q－或 k－。第四，汉语疑母不该是丰田先生所拟的 ŋ－，而应像回鹘文译音那样分为两类——在 o 前面是 q－，在其他元音前面是 k－，顺便说，我在 1988 年写的《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一文中也曾把疑母错拟为 ŋ－，我愿意在此纠正这个失误。

按照上面设定的声母格局，我们可以把丰田五郎认出的那 24 个汉语借词复原成这样：

圣宗皇帝 ʃiŋ suŋ qoŋ ti[③]	道宗皇帝 tu suŋ qoŋ ti
仪天太后 ki ten tai qiu[④]	太子 tai si
大王 tai oŋ	郡王 kun oŋ
太师 tai ʃi	太傅 tai-pu
太保 tai pu	太尉 tai wi

①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第 347、359 页。

② 聂鸿音《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民族语文》1988 年第 2 期；西田龙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中的基本性问题》，《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

③ “皇”的读音是从“黄”（qoŋ）类推来的，《元史》卷九五的“黄兀儿塔海”即《元朝秘史》的“晃豁儿塔孩”（qoŋqortaqai）。

④ “后”的读音参看回鹘文《玄奘传》译“太后”为 tay qyu。又，“仪天太后”这个词本是刘凤翥和马俊山在《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中所释，丰田五郎从之，1996 年刘凤翥在《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读》中又改译“承天太后”（tʃiŋ ten tai qou）。

金吾大将军 kim qo tai siaŋ kun[①]	将军 siaŋ kun
小将军 siu siaŋ kun[②]	西平郡王夫人 si piŋ kun oŋ pu ʒin
夫人留女 pu ʒin liu niu	西京副留守 si kiŋ pu liu ʃiu[③]
使相 ʃi siaŋ	将副 siaŋ pu
都招讨 tu tʃiu tu	王家奴 oŋ ka nu
韩家奴 han ka nu[④]	刘家奴 liu ka nu
药师奴 yu ʃi nu	药师女 yu ʃi niu

上述拟音有的可以解释契丹字形和汉字的关系。例如“使相”的“相”，契丹字作“将”，字形完全假借汉字 tsiaŋ，契丹读作 siaŋ，是因为契丹语里没有 ts－。又如“王家奴”的“家”，契丹字作“牙”，字形完全假借汉字 ŋa，契丹读作 ka，是因为契丹语里没有 ŋ－，这类解释可以旁证拟音结论的可靠性。

在丰田五郎 1995 年复原的 31 个契丹词语中，有 7 个被认作契丹本语词，我们可以赞同其中的 4 个：

数词“五”在契丹大字中的形体和意义完全等同于汉字“五”，此处训读。《辽史·礼志》曾说契丹语“五”读如“讨”，则其音值为 taw，达斡尔语作 taaw，与此相仿。

“马”在契丹大字中的形体是从汉字“馬”减笔而来，字义也是“午”“马”，此处训读。契丹小字拼音作 mori，则大字音值也应是 mori，《华夷译语》作“抹邻”（morin），与此相仿。

“蛇”的契丹大字形体来源不明，字义为“巳”“蛇”。契丹小字拼音同《华夷译语》“抹孩”，则大字音值也应是 moqai。

“郎君”的契丹大字形体来源不明，《辽史·国语解》曾说契丹语“郎君”读如“沙里”，则音值当为 ʃali。

另外 3 个——“兔”“牛”和“鸡”——似显证据不足，尤其是“兔”字。事实上我们至今好像还没有发现和“兔”相当的契丹大字，丰田先生文中写出“兔”字其实是“猴”。

四

按照本文讨论的拟音原则和丰田五郎实践的基本思路，我们也来尝试着构拟一些契丹词语，其中契丹字形和字义的认定均以刘凤翥最新抄录的墓志为准[①]。

天赞（皇帝），见《耶律延宁墓志》第 2 行。契丹“天”字在汉字“天”下增笔而成，“赞”字取汉字“赞”的左上部分。契丹“圣宗”“道宗”都是汉字音读，由此可以推断“天赞”也是汉字音读，音值当为 ten san。

百，见《耶律延宁墓志》第 13 行，契丹训读汉字。《辽史·国语解》：“爪，百数也。”则契丹“百”字当读作 tʃau（爪），《华夷译语》作“札温”（tʃaqun＞tʃaɣun），达斡尔语作 dʒau[②]，与此同源。

统和，见《耶律延宁墓志》第 25 行。契丹二字从汉字“屯”“禾”变笔而来，因此可以推断为音读，音值当是 tun qo（屯禾）。二字连读时，第一字的韵尾－n 受第二字的声母 q－同化，

---

① “吾”的读音是从“吴”类推来的，回鹘文《玄奘传》译“吴”为 qo。

② “小”的读音丰田原拟 siau，今据回鹘文《玄奘传》改拟 siu，为的是避免使用三合元音。

③ 释作“副”的那个契丹字是误译，始见刘凤翥《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他》（《汉学研究》第 11 卷第 1 期，1993 年），丰田五郎从之，1996 年刘凤翥在《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读》中改释为“所有格词尾”。下文“将副”的“副”同此。

④ “韩”的读音是从“汗”类推来的，参看 qahan 译作“可汗”。

① 刘凤翥《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七期，1998 年。

② 本文所用达斡尔语料选自仲素纯《达斡尔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 年。

全词读为 tuŋqo（统和）。

契丹，见《北大王墓志》第 1 行。契丹文第一字从汉字“契”变笔而来，第二字字源不明。汉字“契丹”即契丹国名音译，则其读音必是 ki tan。

月，见《北大王墓志》第 19 行，契丹训读汉字。《辽史·礼志》：“赛咿唲，月也。”武珪《燕北杂记》作“赛离”，则契丹“月”字当读作 ser。《华夷译语》作“撒剌”（sara），达斡尔语作 sarool（月亮），与此同源。

日，见《北大王墓志》第 19 行，契丹训读汉字。《辽史·礼志》：“捏咿唲，旦也。”《契丹国志》载“捏离是日”，则契丹“日”字当读作 ner。《华夷译语》作“纳阑”（naran），达斡尔语作 nar（太阳），与此同源。

时，见《萧孝忠墓志》第 5 行，契丹字从汉字“玻”变笔而来[①]，用为音读。《契丹国志》载“叵是时”，则契丹“时”当读作 po。《华夷译语》中未见“时”的同源词。

州，见《耶律习涅墓志》第 16 行，契丹字从汉字“竹”之半变笔而来，用为音读。回鹘文《玄奘传》中“州”字对音为 tʃiu，“竹”字对音未见，依声韵类推断为 tʃiuɣ，契丹小字拼音系统证明契丹语中的古入声汉字均不带辅音韵尾，则“竹”字读音也应是 tʃiu。

平心而论，迄今构拟出的契丹词语数量极少，远不足以展示完整的声韵系统，更无法为我们提供相关的语音细节。事实上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回答契丹语里有没有阿尔泰语言中常见的辅音同化现象和元音和谐现象，尽管从感觉上说应该是有的，比如“圣宗皇帝”（ʃiŋ suŋ qoŋti）也许实际读作 ʃinsyŋ qonti。然而困难还不限于此，目前契丹语研究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契丹

① 刘凤翥《契丹大字中的纪年考释》，《民族语文》1982 年第 3 期。

字的解读。不难设想，假如我们对契丹大字的辨识是错误的，那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拟音就完全不能成立。迄今的释读工作所涉及的契丹词语虽已上百，但其中得到研究者公认的则为数寥寥，其中一个明显的疑点是，被人们假定的契丹词语大多数都是汉语借词，而人们却很难相信契丹人怎么会如此大规模地借用汉语，甚至是用契丹虚字把几个汉语词串联起来或者略微调整一下语序就构成了契丹语的句子。具体到近年来人们研究颇多的官名和地名来说，《辽史·国语解》明确指出，“史之所载，官制、营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这更使我们觉得契丹文中的此类名词应该多是契丹本语，而不是像现在人们的解读结果那样都是汉语译音词。仔细考虑一下这些情况我们就会知道，解读契丹文字的目标是遥远的，遥远得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

附：汉字和契丹大字对照表

圣宗皇帝	殁伋皇帝
道宗皇帝	道伋皇帝
仪天太后	乏讵天太后
太子	太子
大王	太王
郡王	伉王
太师	太杲
太傅	太付
太保	太申
太尉	太扔

金吾大将军	金伬太将景
将军	将景
小将军	小将景
西平郡王夫人	犀平伍王肖仁
夫人留女	肖仁亢矛
西京副留守	盈京昇亢守
使相	杲将
将副	将昇
都招讨	都苯垚
王家奴	王牙伦
韩家奴	至牙伦
刘家奴	亢牙伦
药师奴	岔杲伦
药师女	岔杲矛
五	五
马	禹
蛇	垂
郎君	兂击
天赞皇帝	垔先皇帝
百	百
统和	先朱
契丹	宂肽
月	月
日	日

时	玫
州	亾

（聂鸿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的应用与传播/赵丽明　黄国营编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10
ISBN 7-80052-575-9
Ⅰ.汉…　Ⅱ.①赵…②黄…　Ⅲ.①汉字-应用-国际学术会议-中国-文集
②对外汉语教学-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Ⅳ.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7410 号

汉字的应用与传播

编　　者　赵丽明　黄国营
责任编辑　施春宏　贾寅淮
封面设计　禹　田
出　　版　华语教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68996153　68326333
传　　真　68994599
印　　刷　北京宏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大 32 开（850×1168）　　字　　数　370 千
印　　数　4000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052-575-9/H·999
定　　价　33.6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百千之会（代序）…… 胡东成（1）
汉字——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李学勤（4）
建立汉语汉字的共同规范…… 周有光（11）
造字与解字…… 饶宗颐（13）

汉字的应用与传播

汉字的传播与承接初论 ……［香港］邹嘉彦（17）
变异性·层次性·离合性·互动性
——汉字传播规律初探…… 赵丽明（27）
日本语言文学里的汉字 ……［日本］陈谦臣（45）
中日文字与文化…… 贺友龄（53）
日本现行初级汉语会话教材的字词频分析…… 张　猛（60）
关于“家”字在韩语中的构词情形 ……［韩国］柳应九（79）
从佛经的诵读看第二语言（汉语文）在朝鲜
民众中的传播…… 关辛秋（89）